

杜勃著
劉詢岳譯

蘇聯的新經濟政策

海燕書店出版

42

F-1



2 014 4324 1

蘇聯的新經濟政策

杜 勃 著
劉 詢 岳 譯



查

海 燕 書 局

• 1951 •

經 濟
蘇 聯 的 新 經 濟 政 策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原 著 者 Maurice Dobb

翻 譯 者 劉 詢 倫

◀ 本書根據杜勃原著(1947年版)選譯其中的第六、七、八、九四章。 ▶

*
*
*

有 限 公 司

1951年10月第一版上壽印0001—4000冊

書號(928) [X III 7] 定價 港 6,000

海 燕 書 店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第一章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三
第二章 經濟復興的初期和一九二三年的「剪刀差」危機.....	三六
第三章 工業化問題.....	七三
第四章 第一次五年計劃前夜的土地情況.....	二六
譯後記.....	一四七

第一章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〇年十月蘇聯和波蘭簽訂了休戰協定，十一月底蘭格爾男爵的殘餘軍隊也放棄了它的『爲了文明』奪回俄羅斯的十字軍，頓巴斯和巴庫的油田，土耳其斯坦棉產區，和外烏拉爾麥產區，都已重歸蘇維埃政府統治之下；到這時候，戰時共產主義作爲經濟制度的不適當，才引起了嚴重的注意。而即使注意到這一問題，在當時的環境中還是不容易獲得解決的，人民和過去兩年半來的各種問題密切相關，這些問題累積在面前，使得人們無暇深思，不能立刻正確地認識當前的局勢。戰時的必要創造了戰時共產主義，在危急期間它起了重大的作用。它的缺點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它必然的後果，在混亂中難於斷言；和平時期改變了的環境，對於原來創造戰時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究竟影響到什麼程度，也不易判斷。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第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初次對跛形集中的企業總管理制度提出批評。特別提出了在中央總管理處和州經濟會議聯合管制下第二類的企業[●]的困難，這一類的企業，實際上奉行中央總管理處的命令，州經濟會議的有關工業管制部門，只是機械地將命令加以承轉。各企業和直接有關的當局，聯繫極不密切，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機構，亦有混亂和矛盾的現象。早在同年三月俄國共產黨第九屆代表大會上，已經強烈地批評了總管理制度。大會上指出：『由於國家的廣大，經濟計算的方法和結果不盡確實，集中的方法（指總管理制度——譯者）不可避免地形成各地企業的游離，引起了可怕的因循敷衍，而對我們的經濟造成無法補救的危害』。十二月中所提出的批評，甚至更為猛烈。討論的結果，約有為數二千的大量企業，都移交州經濟會議接管。這包括了大部份第二類的企業，也有一部份前此列入第一類的。幾乎全部

●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工業的管理依其規模分成三類，第一類由最高經濟委員會的中央總管理處管理，第二類由中央總管理處和州經濟會議會同管理，第三類由州經濟會議管理。——譯者。

紡織工業由此自中央轉交地方管理；只有電氣工程業和金屬工業實質上並未變動，同時州經濟會議完全直屬於州蘇維埃，它的工業管理部門，也不再隸屬於有關的中央總管理處。最高經濟會議也進行改組，第二年中，把五十二個總管理處減為十六個，各自管理一個工業部門，對各州工業機構的活動，施行總的督導，並通過包括本區一些企業的各地的康拜因或組合(Association)，管制仍直屬於中央的企業。大會除作上述調整外，並強調經濟活動的總方向仍舊集中，而工業的業務管理儘可能的分層負責，使工業管理機構對所負責的生產活動，取得最密切的聯繫，這兩方面必須有所區別。但這仍不過是公告一項原則，宣佈一種綱領。進入實踐還需要更基本的變更經濟關係。當時原料的供應和產品的訂貨，仍由中央決定，管理的體系必需適應經濟骨架。直到新經濟政策時期，開放市場，新的經濟自主的企業單位才可能成立，並自主的進行交易，這樣所要求的工業分層管理方成事實。

集中供應的關鍵，在於強迫徵收農民餘糧的政策；恢復經濟中大部份商業交易的關鍵，在於農業和工業的市場關係。使人驚異的是新經濟政策剛開始時，討論的並非

和農民的關係，而是國家工業和工人的關係，這表現在職工會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工業中職工會的正確的作用的激烈的爭論。問題的提出，顯然和準備在第八屆蘇維埃大會中提出的對工業管理的集中和官僚化的討論有關。這辯論是托洛茨基任交通人民委員部長時在鐵路上所規定的制度引起的，首先表現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第五屆職工會大會上，托洛茨基和職工會領袖唐斯基對這問題意見極端相左。托洛茨基主張職工會應成為勞工的軍隊，其工作人員由國家自上而下加以任命或更調。這引起了黨內的某種危機，嚴重到使得列寧在一次宣言中指出：『我們一定要有勇氣正視面前痛苦的真理，黨有了毛病。黨正在因狂熱而動搖。』列寧甚至說到『黨如果不能證明有足夠的力量來迅速而又徹底地醫好這一毛病，將不可避免的引起分裂。』（列寧選集英文版，第九卷二八頁）。十二月中黨中央委員會數次討論這一不同的意見，托洛茨基的主張以四對十票被否決，決議中譴責『把工作的集中和軍事方式墮落到官僚化，獨斷和繁文縟節。』十二月底托洛茨基公佈了名為『職工會的地位和任務』的小冊子，攻擊現存職工會為『手工業式的保守主義』，並『在其中培植着集團的排外精神』，

要求根本『改組』現存職工會，使職工會和工業的管理取得密切聯繫。同時，托洛茨基拒絕參加黨內已經建立的職工會專門委員會；這樣一九二一年一月該委員會由列寧、斯大林、唐斯基等十人簽署的報告，即所謂『十人綱領』，實質上成爲黨的政策。

托洛茨基主張所謂職工會『國家化』，他認爲爲了增進工作效率，職工會應成爲隸屬於國家的機構。環繞着這一爭端的，並非祇有兩方面的意見。參加爭論的還有其他集團。不但有一個『調和派』，包括布哈林和季諾維夫，要求和托洛茨基政策妥協；還有一個重要的工團主義派，實際上贊成把工業管理交與職工會，並反對工業中一長制的原則。這我們在以後還要述及。列寧尖銳地攻擊這三種偏向。同時，盧特樹塔克擬訂一項和列寧的意見相似的政策；贊成職工會保持獨立的地位，並應負更大的責任去組織勞工解決生產問題，阻止偷懶和懈怠。他寫道：『勞工紀律不能由官僚的方法和高高在上的命令來達成』，而是『只有參加生產的全體勞工自覺地履行其任務，才可能建立』。此外還有兩個反對派（奧興斯基和薩普朗諾夫的『民主集中派』、『伊格諾托維斯基派（Ignatovists）』）都反對由黨的政治局來集中決定政策；同時批

評「職工會的官僚化的頑固，與當地需要及廣大羣衆聯系不够」。在爭辯進行之中，動搖的「調和派」趨於分裂，各走各路，季諾維夫贊成列寧，布哈林則向大會提出另一議案，傾向於支持托洛茨基。黨中央的「十人綱領」，反對職工會的國家化和工團主義者的建議，贊成恢復職工會的內部民主，駁斥任何從上而下的改造職工會。職工會的作用是造成黨和非黨羣衆的聯系，吸引非黨羣衆參加集體活動，保護羣衆利益，反對國家的官僚化傾向。同時職工會領袖應參加經濟管理機構，在工人中選拔人員擔任國家經濟職位。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重要的第十屆黨代表大會中，已開始感到一項危機，即職工會問題的討論，可能妨礙到對更廣大的經濟問題的注意；在大會前夜，經濟生活提醒讀者，「主要的問題不是職工會，而是來年的經濟政策問題」。到這時候對農民問題還是注意得不够。參加爭論的人，顯然沒有充分估計到農民問題的重要，或者僅集中注意工業問題，認為如工業產量能增加，農村的困難自將解決。事實上，當時的工業生產，已因供應不足的危機而告癱瘓，而原料和糧食的供應，主要依靠農民。鄉村中

的不滿情緒，更迅速地影響到城市中的工人和士兵，他們原是不久前來自鄉村的。

列寧以其掌握情況的實質的非常能力，很快就看到解決現存困難的關鍵，在於鞏固和農民的聯盟；認識清楚以後，他對應該採取的方針，決不遲疑。要恢復農民的地位成為同盟者，要復興城鄉產品的交流，必須取消餘糧徵收制度，而初步代之以實物的農業稅。這就是他向黨代表大會提出的建議。農業稅按農家維持最低限度需要以上的生產淨額比例徵收。稅率是確定的，並非從前的任意評斷；僅徵收農民剩餘產品的一定部份，這將刺激農民積極生產，因為這樣方能增加他本人所能自由處理的部份。在嗣後公佈改變現況的新法令的附註中，有如下的解釋：「由於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部長會議的決定，今後取消餘糧徵收制度，舉辦農產實物稅……納稅以後，剩餘農產品可由農民自行全權處理……每一農民現在必須認識並牢記，耕種的土地愈廣大，全部歸他所有的剩餘糧食的數量愈增多」。現行徵稅額係

● 糧食稅參照家庭人數，對富農是累進的，初時甚為繁複，徵收各種產品一部份。其後簡化為徵收貨幣的單一稅，一九二三年後全部以貨幣繳納，不再徵收實物。

根據士兵和重要的國營企業中工人的最低限度需要的糧食，約爲前此餘糧徵收額的一半。列寧在對大會的演說中稱：『以實物稅代替餘糧徵收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要點在於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並不一樣，工人所爭取的，小農並不亟需。但只有和農民協調我們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如果不在經濟上滿足中農並恢復自由市場，我們就不能維持工人階級的政權。如果某一些共產黨員空想可能在三年之內改造整個經濟基礎，變革農業的根基，他們一定是夢想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我們之中，是有少數這樣的夢想家的』。一個月以後列寧寫道：『糧食稅是從因極端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而被迫採取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進入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的一種過渡形式。……我國經濟至今還破壞得如此不堪，戰爭把我們仍迫得這樣厲害……以致我們尚不能拿出工業品從農民那裏換得我們所必需的全部糧食。我們懂得這點，所以施行糧食稅，就是把最必需（對軍隊和工人）的糧食量，作爲稅收徵來，而其餘的糧食，我們將用工業品去交換』。（同上，一七八頁）。

乍看這似乎是比較次要的改革：以預定的、只徵收農民剩餘產品一部份的糧食

稅，代替前此徵收全部剩餘農產，而前此的稅額又往往武斷。列寧本人也承認這還是不澈底的改革：糧食稅「包括前一辦法（餘糧徵收制）的一部份，也包括以製造品交換農產品這唯一正確的制度的一部份」。但這辦法一經施行，自然也就聯繫到其他一連串的步骤。首先必然要恢復農民本人支配下剩餘農產的自由貿易的權利（否則農民可以支配剩餘農產不過是名義上的讓步，對刺激農民增加生產影響甚微）。這又牽連到復興農產品的市場，恢復市場關係，作為農業和工業的重要聯繫，並作為恢復了的貨幣流通的領域。起初農產品的自由貿易的權利，僅限於本地的市場；但這限制很快就取消了。恢復農民對產品自由貿易的權利，列寧在第十屆黨代表大會中很早就強調，與中全部農產品再重行分配的戰時的獨佔，是黨員部分開，使合作社恢復了在商業市場上的自決權利。循序推進的又一步驟，為禁止通過中央機關集中供應工業用的原料和糧食，而代之以分層負責的制度，各企業生產的產品，可自行洽訂合同。這是在一九二一年度逐步實行的。國家機構今後有權在公開市場上交易，不再由中央

分配供應；這第一步開放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大部工業可自行交易半數的商品，另一半仍須交給中央，通過集中供應分配，換取一部份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兩個月以後，這些企業完全自由，不再依靠原料和燃料的集中供應，並有權在市場上出售其全部產品，不再限於產品的一部份。在開始幾個月中，各單位的工業和其他機構及農民之間，係運用直接的物物交換的辦法，來取得彼此需要的物品，這是異常麻煩缺少效率的制度。但購入供應品和出售產品這兩組交易，很快就分隔開了，國營機構以及工業和農業之間正常的通過貨幣的交易興起。全部過程的完成是工業編組成財務獨立的單位（大部份重工業等爲例外）。『不再列入國家預算的項目』，而『轉變成企業化』。這就是說，工業不能再獲得貨幣補助金，而需自行平衡收入與支出，這將儘可能促使生產過程經濟化以減低開支，並使決算表上可有盈餘。

二

因新經濟政策的施行而奠定了基礎的新的工業管理分層負責制度，它立足在所謂

托拉斯的商業化的自主單位之上。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及一九二二年中，這些托拉斯，在脫離了國家的供應也免除了將產品交給國家的義務的工業中，迅速組成，特許成立。根據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法令，企業被分爲二類：一類仍依賴集中的國家的供應，另一類在財務和業務上准予完全獨立。第一類的主要工業是燃料和五金。又根據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另一法令，第一類工業被縮小了範圍，並限於下列企業：『其產品僅供國家應用，不能在公開市場上銷售；或其產品的大部份係交與國家者』。易言之，即限於兵工廠和軍需工業，某種公用事業，機車工廠，和某種爲集中的建築計劃的定貨的，例如包括在電氣化計劃中的那些五金工廠。這一類企業均由集中的國家機構管理，類似從前的中央總管理處。同時，第九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確定了一項原則：『所有國營企業，不問是否由國家供應，經營必須企業化』。

新的組織形式，應用於目前佔工業的主要部份的第二類企業，特別是供應一般消費者的工業。對它們的活動的監督，是掌握在已經代替了五十餘個中央總管理處的位置的十六個新的中央工業處（在最高經濟會議下）的手中；它們的任務，是首先按照

新路線計劃並監督工業改組的進行，然後在各種範圍內，對於工業托拉斯的政策和活動從事總的管制。但有許多情形，工業的改組，開始時並非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企業的領導者和地方經濟部門熱情地掌握這一新發現的自由，開始將當地企業聯合成爲托拉斯。有一些企業，一反前此的集中主義，作爲一個獨立的單位，欣然躍入市場中去，幾個月來像游擊隊似的獨立作戰，並沒有轉向任何的紀律管制之下。但祇有存貨豐富的企業才能這樣做法。那些爲要繼續生產，必須由市場購買供應品而缺少資財者，便不得已地將他們的財產聯合在一起，像蕩子之於父親一樣，要求上級當局分發少許流動資金，以便開展他們的事業。雖如此，仍發現有些企業，因急於要利用獨立的機會，在異常混亂的情形之下，聯合成爲托拉斯。他們聯合的原則常常是錯誤而又矛盾的。各企業常常衝突和重疊；過多的地方性的托拉斯——洛秦佛爾特稱作「小托拉斯」的——除要求獨立外，並無存在的理由。因此，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了調整托拉斯的中央委員會，重行改組業已組成的一些托拉斯。並消滅矛盾情形。

使各企業聯合組成托拉斯的根據各有不同，由於各生產部門的技術和市場條件的